

走向

市场化的中国经济

■ 董辅初 著



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

董辅初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 梅 齐伟娜

责任校对：徐领弟 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舒天安

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

董辅礪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660×990 16 开 35.75 印张 570000 字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2731-6/F·2122 定价：6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世纪之交，同时也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交，中国经济遇到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以往延续下来的，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而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了或突出出来了；有些问题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新产生出来的，其中有些也与计划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些问题正在孕育形成，将会在 21 世纪显露出来或突出出来。中国的经济问题，无论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也好，当前新产生的也好，还是未来将突显出来的也好，都是中国在前进中，在改革与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在前进中，一些问题产生了，解决后中国的经济就再向前迈进，接着又会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产生，它们在获得解决后，中国的经济又再向前迈进。常常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同时也有些老问题会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是经济运动的辩证过程。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必须时刻跟踪经济运动中这种问题的演变，永不停息。因此，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也必须常思不懈，永不停步；否则，思想就会僵化，就会落伍。这是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一点切身的感受。正是感受到这一点，我总是不敢稍有懈怠，奋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本书与我的其他一些书一样，就记录着我在跟进中的脚印。

这本书收集的主要是 1998 年 8 月中旬以来到 1999 年编本书前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记者的采访录，在这之前的文章大体已收集到其他陆续出版的书里了，但本书中也有一部分文章和记者采访记录未收集在此前出版的那些书里，其中有些是 1998 年 8 月中旬以前的，也有少数是 1996 年和 1997 年的，个别是 1995 年的。本书中的文章大多短小，几千字，也有少数较长，上万字，甚至 2 万字以上。

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和记者采访录，经过我的编排，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关于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思考，共有两篇，用作本书的代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如此肥沃的研究经济问题的土壤上，应该产生有分量的甚至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在推进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也肩负着艰巨的责任。我自己滥竽充数，跻身其中，也应当尽绵薄之力。我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说三道四，这两篇东西都是在无法推脱甚至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谈的，好在我也不是权威，谈得对与错都不会产生“一言九鼎”的效果，只是作为一种见解，提供给同行参考。

第一部分是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问题。世纪之交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交织在一起。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二十来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在 21 世纪的腾飞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众多的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挑战。在这一部分文章中涉及外部的挑战谈得很少，在其他一组文章中关于民族工业命运的两篇文章有所涉及。本书收集的文章主要谈来自中国内部的各种挑战。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只能通过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的改革才能逐步解决。

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在中共十四大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结束了长时间中对改革目标的激烈争论。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奇怪的是，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去作进一步的研究，除去有个别文章对此有所涉及外，再也看不到人谈它。其实，这个问题绝非不重要，更不是已经解决了，事实上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理解，而从这种理解出发，会导致错误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就我所知，有两种在我看来不正确的理解：（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此说来还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即把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方式，理解为具有社会的属性，这样的理解会使我们把现代市场经济的成果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加以拒绝。（2）理解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其与计划经济的微观基

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公有制只能成为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而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种理解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主义 + 市场经济 = 社会公平 + 市场效率**。

从本书和我的其他著作，如《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读者也可以看到，我对改革中的许多问题的见解都是以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理解为出发点的。例如，我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理解出发，提出了我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意见。我在 1985 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论点（即大家知道的“八宝饭理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就是从各种所有制各有优点和弱点；弱化各自的优点，强化各自的弱点，以便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出发的。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的落后性和多层次性”都无法透彻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这种混合经济，为什么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而最后会得出结论：在越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大发展后，我们还要回到单一的公有制，回到计划经济，我在本书的有关一些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我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中深切感到，经济理论必须是彻底的，必须是成系统、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否则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导致一项项理论的自我否定和各项理论的彼此矛盾。从 1985 年起我就不赞成只让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而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本书之前的一些著作中已有论述，在中共十五大将它“正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在于继续去除各种歧视和障碍，同时解决自身的问题。这部分中有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第三部分文章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我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联系在一起。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我已经研究了许多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思想，集中体现在本书收集的《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等文章中。实际上，这些文章中的思想在 80 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形成了，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我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随后在《改革》

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功能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其后的文章是在此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细化。我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是不同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从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出发,从而给予恰当的定位。在80年代中后期我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大类,即竞争性企业与非竞争性企业,后者又分为两小类,即公益性企业与自然垄断企业。随后结合这种分类提出国有企业按功能定位后,在上述分类中哪类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和发展,哪类国有企业应该退出。我曾一再提出,就是为社会及其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其基本需要和共同需要的功能、为政府的政策的实施提供物质条件的功能、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功能、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的功能。从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这种功能出发,我进一步提出国有企业需要在六个部门保留和发展,同时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非国有(特别是非公有企业)去发展。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有各种退出的途径,利用资本市场退出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上述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最早是我提出来的,起初有人反对,以后赞成的人逐渐多起来了。收入本书中那篇《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文起先送到一份报纸,报社编辑部有顾虑,不敢发表,以后送给《经济研究》编辑部,于1999年第6期发表了。实际上,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上述思想同以后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是吻合的。有意思的是,我在《改革》1995年第4期的那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应“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并已有“有进有退”的思想。1999年8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在其采访录中写道:“记者详读过董辅礪《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按‘功能’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实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改组举措,是他坚持的国有企业改革观点。”(见本书《怎么看待股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作用》)。这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其实,应该说,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的要求,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改革国有企业所必定会得出的结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首先必须在宏观层次上按照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然后才谈得上在微观层次上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改组,即让那些应该保留

和发展的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得以保留和发展，让那些应该退出的国有企业以不同的方式退出。改组为股份公司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方式，但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国有企业退出的一个途径和桥梁。这组文章中的《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一文，是在我主持的“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效率”这个课题的第3期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写成的，课题组的同事帮我做了数据的处理。此文写于1998年，至今未发表。这个课题是迄今国有企业研究中样本最多、数据最多、数据的时间序列最长（15年）的一个课题，它记录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第1~2期研究成果已汇集成书出版。我在第2期研究中写过一篇《双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文（见拙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在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有企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从一些方面反映了这种变化。

第四部分是关于发展中小企业。收入的文章不多。发展中小企业问题，是最近才引起重视的。虽然我已于1998年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委员会，但继续参与着全国人大财经委与德国的立法合作项目的一点事，还参与了中德合作中的一点事，我被吸引到发展中小企业的活动中，包括德方赞助的研讨活动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制定。在我国，发展中小企业确实值得重视，其中有许多特殊的问题要研究和解决。我自己只是开始接触，还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

第五部分是关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节。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以宏观上即总体上对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还在进行，市场还不完善，市场的主体还不能完全按市场信号运作，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还不多也不完善，同时政府也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经济的经验，因此，如何从宏观上调节经济是很需要研究的。我自己对从1993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的宏观调节一直密切关注，而且从1992年底起就已经开始关注了，写了一系列文章。在1992年12月，在该年的年终前，《现代企业导刊》编辑部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我就对那时的经济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经济已经局部过热，还没有全面过热，可能走向全面过热，如能及时调整可能防止全面过热（见拙著《1992年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发展研究》（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51~452页）。当时，大家对经济形势一片乐观，会

上没有人赞成我的判断。但我言中了。1993年上半年经济迅速转向全面过热，而且越来越热。1993年7月政府实行“加强宏观调控”，即实行紧缩政策是必要的，我很赞成。但当时有些经济学家反对，有一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之争，对此我曾著文评述（见上书第460—464页）。自那前后，直到现在我写了不少论述宏观调节的文章，分别收入于拙著《经济发展研究》、《政策与发展——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香港《华南经济新闻》，中国工商轻工出版社，1995年）、《中国经济纵横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市场经济漫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几本书中。现在看来，我的看法都被日后经济形势的发展证实是恰当的、正确的。例如，在开始这次宏观调节前，我在提出要治理经济过热、平抑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指出，追求“零通货膨胀”是不现实的。在开始加强宏观调整后没有几天，我就著文指出，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在紧缩方面、紧缩的力度和紧缩的时间上应“掌握得当，并及时调整”，避免发生“大面积企业停产、半停产”，“再次发生广泛的市场疲软”，应“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再调整调控的力度”（《加强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1993年8月3日《广州日报》，见《市场经济漫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接着不久，我又指出，宏观调控应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再松一松，不能是一直紧，也不能是一直松，即不赞成把紧缩政策作为中长期不变的政策（《改革与发展——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第20、23页，中华工商出版社、华南经济新闻，1995）。在1995年，我指出，“目前在实行总的紧缩政策的同时，要适当开始放松，不要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太快太长，以免可能使经济窒息”，“宏观调控组合点应该转移，不能只是控制投资，压缩需求。”（《目前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收入《经济发展研究》（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在1996年，上半年，我又指出，已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治理经济过热，已不应是当前政策的主要取向，如继续目前的紧缩力度，在惯性的作用下，经济的困难还会进一步增加。在1996年4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我又指出，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有必要适当放松对资金的总量控制，同时优化资金的投向；主要是有选择地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我的意见遭所有的委员的强烈反对，并被指责这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当时的争论被简单地整理出来。现附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之后（见《关于宏观

调节的一场争论》。可惜的是整理得太简单，没有把当时争论的激烈和精彩的程度反映出来。尽管有人反对，我仍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再呼吁停止“适度从紧”政策，1998年2月，在全国人大开会前，在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成员最后一次参与当年的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金融政策的预审时，我都对继续实行紧缩政策的安排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要求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有效需求，扭转经济的下滑。本书中，有两篇文章和一篇报告记录，反映了自1992年以来我对宏观调节的看法，这就是：《对宏观调节的几点思考》、《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中，我还按年代排序收入了有关的一些文章。但没有收入1996年以前的文章，这些文章和1996年和1997年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收入在上述的那些书中，而不在本书中。如果把1992年至今我的这方面的文章集中起来，将更能看到我对这一轮宏观调节的系统看法。

第六部分是关于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问题。这一部分收入的文章最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问题兴趣更大，而是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我参与了《证券法》和《期货交易法》的制定工作，对证券、期货市场的问题接触较多，同时，证券、期货市场作为建立不久的市场，问题也多，人们的看法的分歧也大，此外，《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约我写专栏，有一段时间每周登一篇，因此就写得多一些。我对发展证券、期货市场问题的看法大体上反映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问题》和《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几点反思》。前一篇文章是国家计委受世界银行委托所作的《关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大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我写于1998年上半年，1999年请华夏证券公司的华夏证券研究所帮我更新了一部分数字。国家计委（后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同意我发表，但由于篇幅较长，除华夏证券研究所印了内部的单行本外，一直未全文公开发表过，起初，《经济学家》于1999年第1期发表了一部分，后《人民日报》于1999年6月21日发表了一整版。这次在本书中是第一次全文公开发表。

第七部分是关于金融和财政问题。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实行企业经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这是必要的。欧洲是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美国和日本实行过分业经营，但最近都转向混业经营了。分业经营虽能便于控制金融风险，但它又会带来另外的金融风险，

而且会压抑金融创新，更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我国的《保险法》和《证券法》的实施中分业经营带来的问题正逐渐显露出来，以致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来补救。这一组文章中有几篇是谈分业经营、金融风险和金融创新问题的。对金融风险加以防范是必要的，但应像大禹治水那样，重在于疏，而不在于堵。1998年的防洪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工作应注重创新，在农村扶贫中也需要金融创新。索罗斯是国际著名的金融家，本组中有一篇关于索罗斯的理论的文章，那是一篇书评。他确实有一套独特的见解。有关预算和财政的文章，以前我写得较多，近来写得很少了，除有关利息税的一篇文章外，都是以前写的，它们未收入其他书中。

第八部分是关于市场运行与市场规范问题。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既要有市场规范也要有道德规范。二者有一致性，但也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处。有时人们常用道德规范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导致判断上的差异。由于对市场经济仍不熟悉，往往在认识上出现失误，对买方市场和重复建设问题的认识就是例子。对此我在其他著作中也谈过。在开放的条件下，民族工业的命运问题，令人关心，曾引起争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个问题肯定还会有争论，有两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

第九部分是关于消费问题。从60年代起，我在国内就最早研究消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继续涉猎市场经济中的消费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方式都与计划经济时期有很大差别。在本组的文章中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消费的观念问题。当然历史的、文化的传统，仍会对我国人民的消费继续发生影响。

第十部分是关于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每年我都应邀到各地去参加一些发展地区经济的会议，这对我了解各地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很有帮助。在各地的活动中，我都不得不谈一点意见，当然谈得浅薄。在这一组中收集的文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有些地方，我讲过后没有加以整理，或者没有写成文字，这里就无法收入了。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没有专门谈西部大开发战略，因为，当时尚未提出此战略，我在以后陆续写了一批西部大开发的文章，没有收集到本书内。不过，我在此之前，在80年代就已经多次论述西部开发的问题。在本书中就有两篇谈及中西部发展的文章。

第十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我的专业，谈政治体制改革也非我所长。只是在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时必定会碰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令我不能不去想一想，于是就有了本组中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录。当然，即使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也是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

最后有一篇附件，是悼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启贤逝世10周年的。他对我国经济学是有贡献的，本可以贡献得更多更多，可惜早逝了，我在经济研究中有得益于他之处不少。发表此文既为了悼念他，也为了鞭策自己。

上面的文字只是对本书的内容勾画出一个轮廓，以便读者的阅读，也便于读者批评。

编这本文集不容易。先要收集自己的文章。我自己不善于做收集整理的事，常常是文章发表了，我收到后就放在一边，甚至看也不看就放到一边，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还往往有这样的事，文章发表了，甚至稿费也寄来了，但却收不到发表文章的报刊，过些时候我就忘了，也不去问了。在本文集中就有些文章已经发表了，但我已不记得发表于何处，凑巧还留有底稿，所以得以收入进来。幸亏我的妻子留心了这件事，静悄悄地帮我收集整理，只要她知道的，看到的，就井井有条地收集起来，整理出来。这大大便利了这本文集的编辑。不仅如此，她还催促我作这件事。我总是习惯于先做当前的事，把可以拖一拖、放一放的事，往后拖，往后放，而当前的事又是做不完的。为编出这本文集，她总是要我推掉一些应该推掉或可以推掉的事。没有她的催促和帮助，这本书不知要拖到何时才能编出来。因此，我很感谢她，她真是我的贤内助。

这本书是利用我在澳门大学讲课期间编成的。到了那里应酬少多了，杂事没有了，除了备课，就是编这本书。我静静地专心致志地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订正。我一边看，一边想起我在写那些文章或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情景：当时的经济情况、经济学界的动向和我自己如何形成那些看法和理论。聊以自慰的是，我自己的看法还能经受时间、实践的检验，具有一贯性，而不是左右摇摆，而且越来越能构成一个体系（集中体现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我也欣慰，虽已年过七旬，我还有充沛的精力，在中国这块研究经济学的肥沃土壤上继续耕耘，因

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良好的体魄。今年我母亲冥寿100岁，父亲冥寿101岁，我以此书纪念他们。

1999年12月4日于澳门大学

本书从编好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没有交出版社，因为正好有两位同志应约要写有关我的书，他们先后将书稿借去参考。书稿归还后，自己杂事缠身又搁了几个月。目前才算可以交出去了。如果没有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编辑金梅同志的催促，我可能还要拖下去。此书能出版，金梅同志帮了许多忙，在此致谢！

2001年3月22日于北京

代序 (1)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复旦大学和《上海证券报》邀请我来参加“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研讨会，这个问题很难也很大。要我来讲这个问题，心里很惶恐。到上海以后看到一本书，叫《财经》丛书，里面登了几篇文章，我想很可能要我就书里面的一些文章提出看法。这些文章里面有陈彪如同志的一篇文章，叫《要走我们的路》，李扬同志有一篇《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经济学人》，还有宋承先同志的一篇文章，是谈菜篮子的。我今天仅谈几点，以就教于大家。

(一) 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首先想谈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分支、不同的学科。我们过去在谈经济学的时候，非常简单地按阶级把经济学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无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又称西方经济学；还有第三类，就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常鲜明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把西方经济学笼统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呢？我们过去都是把西方经济学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我不否认经济学是一个涉及人们利益很深的学科，经济学家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集团的利益，对世界、对经济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同的利益倾向和看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确实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具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把西方经济学都笼统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有些欠考虑的。一方面从西方国家来看，阶级的关系已

经发生了变化，和早先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许多资本家，有一些巨富，但是在现代，特别是当代，财产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越来越公众化了。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谁是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产权公众化了，有时已经很难界定谁是资本家了，许多企业你不知道谁是老板，如果有老板，公众就是老板，有股票的就是老板。在公司里有大股东，但大股东也不一定拥有51%的股权，或许只有百分之几的股权。所以随着产权制度的变化，很难说谁是资本家，这样，资产阶级的概念也变化了。西方很强调中产阶级的作用，中产阶级这些年发展很快，而且成为西方社会里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样，我就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像过去那样，笼统地，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把它统统当作我们批判的对象呢？现在我们已经不都这么看了。

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分支，而且不同流派、分支之间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些流派、分支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又是什么？我想这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研究市场经济，特别是研究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研究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因此西方经济学又可以叫做市场经济学。甚至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但它主要研究市场经济里的生产关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在《资本论》里，仍然有很多关于市场运行的论述，不过它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论述得那样精密、精致，它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研究的，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种种失败，如收入差距扩大，竞争产生垄断等等。于光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丰富的宝库，一点儿不错，它对于我们研究市场经济，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最近我们讨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外延增长、内涵增长，这些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里就有论述。马克思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农业问题时也有过论述，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把西方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的理论，即市场经济学的话，在我们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我们是否有必要像有的经济学家讲的那样建立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而且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西方不同，前提也与西方的不同呢？

我不相信能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学，因为我们的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无论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建立一个概念体系都与西方经济学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学呢？

在此，我想顺便说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它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到外国去，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按照我的理解，这好懂得很，社会主义可以是一种理论，一种理想、一种政策、一种社会制度，也可以是一种道德规范。但社会主义从产生到现在，无论它作为一种理论，理想、政策、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我们要把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市场经济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此，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则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两者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有人又问：有些西方国家，如北欧国家不也是要实现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吗？那么它们的市场经济是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我说如果它们真正做到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那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只能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他地方就不能有呢？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就会有失败，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因此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而在实现社会公平时，又不能降低市场效率，要把它们结合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根本上也是市场经济学，因此，我不相信能建立另一套和西方经济学根本区别的、连概念体系都不同的中国的经济学，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西方经济学不能说是一个完成的体系，它本身还在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在描述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时非常精致，非常精密，有些细微问题研究得非常严密。但它要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困难了，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二元经济，特别是在二元经济里还有一些前市场经济的东西，那里，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或者并不发达，并未涵盖整个国民经济。一般人谈二元经济是指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并存，其实，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并存。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时西方经济学无疑是有用的，对

研究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也是有一定用处的，但反映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在运用中困难是很大的。

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对象，研究其经济怎么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向发达的状态转变，或者说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的一元经济转变，从而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有各种流派。二次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就有像阿瑟·刘易斯等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被应用于发展经济学，当西方的经济学被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它本身也要发展。发展经济学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体系，也还在发展过程中。

（二）中国经济学家应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点看法，中国应该对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做这一个报告。当时讲了一个想法：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国家很大，又处在二元经济的状态，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又相当不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等各种各样的不平衡。我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经济学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是遇不到的。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些可以，但有些是不可以的。因此，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只要在这块土壤上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经济学的成果，而且会成长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甚至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我相信这一点。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一个时期。转变中的许多经济问题是人们没有遇到过的。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还是占多数。这些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如何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问题，由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而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又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问题，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这许许多多的国家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而我们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条件，而是不